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8 期 总第 56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22 年第 8 期 · 总第 56 期

热点观察

中阿合作给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1
中美关系迎来“机遇之窗”·····	2
首届数贸会签约有望破千亿元 数字贸易动能澎湃·····	3
中国加入 DEPA 将成中智合作新的推进器·····	4

学科前沿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8
从学科分野看经济史研究现状与未来·····	10
加快构建国际大宗商品治理体系·····	14
积极应对大数据伦理问题·····	16
创新中国的国际规范研究·····	19

经管资讯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21
组团“出海”抢单 传递经济复苏决心·····	27
欧盟要反制美《通胀削减法案》·····	28

责任编辑：董岳珂

编辑：李岩

日期：2022 年 12 月 20 日

中阿合作给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阿双方的通力合作，是一种强大的确定性因素。中方提出将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汇聚了中阿在双方关系发展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共识，是在过往合作基础上面向未来的顶层规划，将引领双方未来合作的方向，推动双方实现更丰富的发展成果。

12月7日至10日，习近平主席赴利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前驻沙特大使、前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此行，是中国外交的又一重大创举，体现了中阿双方面对全球挑战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将引领中阿、中海和中沙关系迈进全面深化发展的新时代，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吴思科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来到新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都在思考，未来之路怎么走？中国对此的决心和信心都很坚定。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阿拉伯世界很多国家也有同样的诉求。首届中阿峰会、中海峰会的成功举办，切实反映了中阿双方在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共同诉求。同时，也反映出双方长期友好往来构建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双方在此基础上，一同谋划未来发展，对于促进中阿关系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谱写了中阿关系崭新的历史篇章。

吴思科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中东之行，除了出席中阿峰会和中海峰会，也与众多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晤，体现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高度的政治互信以及强烈的合作愿望，把双方合作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能源、粮食、投资、绿色、安全、航天等一系列领域，中国对推动双方合作都持有高度开放的态度。这些领域的合作也非常契合阿拉伯国家的发展需求，必将取得丰富的合作成果。

当前，全球经济遭遇多重挑战，例如能源危机、个别国家鼓动“脱钩”等。吴思科认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加强经贸合作，不但有利于双方发展，也将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个别国家近年来鼓吹对华脱钩，还给国际社会不断施加压力。我们看到，阿拉伯国家普遍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而是着眼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清醒认识，主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吴思科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阿双方的通力合作，是一种强大的确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在制造业等领域拥有很强的实力，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因此，过去几年，双方经济合作实现了逆势上扬。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人口约占世界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双方的合作也将给世界经济注入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中方提出将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涵盖支持发展、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创新、能源安全、文明对话、青年成才、安全稳定诸多领域。吴思科表示，中阿双方的合作重点，基于双方过往合作的实践经验，也基于双方当前的发展需求。

“习近平主席曾提出，中阿要构建‘1+2+3’合作格局。‘1’是以能源合作为主轴，‘2’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3’是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在习近平主席的亲自推动下，双方在这些领域实现了丰富的合作成果。现在中方提出‘八大共同行动’，汇聚了中阿在双方关系发展以及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共识，是在过往合作基础上面向未来的顶层规划，将引领双方未来合作的方向，推动双方实现更丰富的发展成果。”吴思科说。

作者：袁勇

来源：《经济日报》2022年12月13日第012版

中美关系迎来“机遇之窗”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晤后，中美之间举行了多场会谈。其中，中美双方对经贸问题的沟通交流是重点之一。

据中国人民银行消息，11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就相关经济金融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建设性的交流。

据商务部消息，11月18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泰国曼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应约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双方对共同关心的中美经贸问题和多边、区域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专业、建设性的交流，且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中国需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加剧对抗，都有缓和紧张局势的内在需要。

在徐洪才看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双方都希望通过管理风险和防止冲突来规范竞争。今年，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并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与中国展开竞争，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在日前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上，美国与东盟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迹象表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仅体现在科技创新等诸多领域的正面交锋，还体现在争夺更多的“中间地带”。

徐洪才说，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产业链完整且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国内市场广阔，经济富有弹性。在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推进改革开放，主张同美国进行以规则为基础的良性竞争，坚决反对零和博弈。中国将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灵活应对美国的竞争。徐洪才表示，如今“机遇之窗”已出现，中美经济不应该被政治化，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推进多层次务实合作。

目前，中美经济高度互补、深度互融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为6398.3亿美元，同比增长5.1%，其中对美出口增长6.6%。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双边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徐洪才建议，

中美双方应加快启动新一轮经贸谈判，确保美方全面取消对华不合理加征关税。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促进投资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此外，中美双方应积极开展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将逐步恢复经贸合作作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和“助推器”。

作者：张寒梅

来源：《中国贸易报》2022年11月24日第003版

首届数贸会签约有望破千亿元 数字贸易 动能澎湃

12月12日，首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简称“数贸会”）之江数字贸易主论坛期间举行重大项目签约仪式。本次签约仪式现场签约项目24个，签约金额493亿元。《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签约仪式上获悉，预计本届数贸会浙江全省场内外将签约项目近90个，总投资超千亿元。与会嘉宾指出，数字贸易作为贸易新形态发展动能澎湃，正成为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

首届数贸会以“数字贸易商通全球”为主题，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商务部联合主办，于12月11日至1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记者在数贸会现场了解到，当天签约项目呈现系列亮点：产业层次高，主要涉及数字经济、总部经济、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大好高”项目多，聚焦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签约了一批来自500强、行业龙头及独角兽企业投资的引领性、示范性强的项目；合作形式多样，有战略合作、投资协议、大宗贸易、跨境电商等各种合作形式，大力推动研发制造、市场营销、跨境通关、物流仓储、贸易融资等投资贸易全环节数字化改造和场景应用，多种形式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除了项目签约，数贸会还围绕数字贸易产业、平台、生态、制度、监管五大体系，聚焦前沿议题，举办一系列高层次论坛会议，开展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先锋奖（DT奖）活动，发布“2022全球数字贸易行业企业Top100评选”、《2022数字贸易企业百强榜》、《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1）》等一批重磅成果。12日当天，杭州国际数字交易中心正式揭牌。交易中心聚焦培育发展数字应用新兴商业模式和新兴业态，截至目前，中心已与215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上架产品428件，实现568笔交易业务，累计实现交易金额10.91亿元。

福布斯中国“2022全球数字贸易行业企业Top100”评选结果也于同一天发布，阿里巴巴集团、拼多多、得物、华为、新华三集团等45家中国企业入选。

之江数字贸易论坛上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1）》（简称《报告》）显示，数字贸易作为贸易新形态，为世界经济复苏与全球贸易增长注入了新动能，正成为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新引擎”。我国数字贸易国际市场布局呈现优化态势。在2021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排名中，中国以3596.9亿美元规模位居全球第五名，美国、爱尔兰、英国、德国分别以9633.7亿美元、6399.2亿美元、5235.6亿美元、4547.1亿美元的规模

位列前四名。从增速来看，中国以 22.3% 的增速，领先于美国的 9.6%、爱尔兰的 8.2%、英国的 9.0%、德国的 17.5%。

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局长吴政平在日前的数贸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已成为数字贸易大国，电商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数字产业化基础更加坚实，产业数字化步伐持续加快。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总值 2.3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4%；其中数字服务出口 1.26 万亿元，增长 18%。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额达 1.2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9.8%；其中数字服务出口 6828 亿元，增长 13.1%。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五年来增长近 10 倍，2020 年和 2021 年连续实现高速增长。

吴政平表示，在全球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数字贸易“规则赤字”受到各方关切的背景下，举办一场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博览会，将在促进我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数字贸易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王文博 魏董华

来源：《经济参考报》2022 年 12 月 13 日第 001 版

中国加入 DEPA 将成中智合作新的推进器

“我对中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前景充满信心。”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报近日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 8 月，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 DEPA 的谈判。去年 11 月 1 日，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DEPA。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牛清报称，中国加入 DEPA 将成为双边经贸合作新的推进器，促使中智企业在 DEPA 框架下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大福祉，共同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长期以来，中智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向好，中国连续 12 年蝉联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据智利海关统计，2021 年中智双边贸易总额达 6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牛清报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智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将为中智经贸合作带来无限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智利是中国在拉美“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牛清报认为，中智贸易得益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也将推动中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将再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1 中智双边关系呈现三大特点

《21 世纪》：迄今，中国和智利建交超 50 年。您如何评价双边关系所具有的特点？

牛清报：建交 52 年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关心推动和社会各界参与支持下，中智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务实合作硕果累累，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我认为，中智关系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开拓性。智利是拉美大陆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建交以来，智利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始终走在地区前列，是拉美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举办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的国家，也是拉美第一个同中国签署自贸协定并率先实现升级的国家。二是互利性。中国连续 12 年蝉联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中国需求”促进了智利矿、农、林、渔等产业发展，提高了当地就业水平和人民生活。新冠疫情发生后，中智守望相助，抗疫合作成为两国人民友好新载体和两国合作新亮点。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智利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探索 5G、云计算、新能源公交车等合作新领域，为智经济优化升级提供重要助力。三是战略性。中智都是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维护者。作为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已超出双边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地区性、全球性影响。智利率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智利时任总统两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全球互联互通。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智坚定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致力于加强国际卫生体系。当前，中智关系面临新的机遇和使命。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中智两国元首举行双边会晤，为新时期中智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中智关系一定能继续阔步向前，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

《21 世纪》：结合经贸、投资数据变化等情况，您如何看待两国经贸往来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趋势？

牛清报：中国已连续 12 年蝉联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智双边贸易额在 2021 年全年“井喷式”同比增长 49% 的高基数上，2022 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10%。中国是智利主要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在智投资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这为双方、特别是项目所在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在新冠疫情延宕、全球贸易疲软的背景下，中智经贸合作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再次证明了中智合作互利共赢。中智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将为中智经贸合作带来无限机遇。

2 智利农产品对华出口强劲

《21 世纪》：长期以来，智利樱桃、牛油果等农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请问，两国在农业贸易领域取得了哪些亮点成果以及原因所在？

牛清报：智利是优质农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名副其实的水果生产大国。智利樱桃、牛油果、三文鱼等特色产品享誉全球，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农产品贸易是中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智利农产品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根据智利海关数据，2022 年前三季度智利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201.6 亿美元，其中对华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40.2 亿美元。其中，智利新鲜樱桃对华出口总额为 13.5 亿美元，占智利新鲜樱桃出口总额的 88.2%。智利新鲜樱桃不仅为中国消费者和智利种植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成为中智两国沟通的一座“桥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拉近了民心。两国农产品贸易特别是智利农产品对华出口强劲。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几方面利好：一是智利中部地区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种植技术水平较高，农产品品质好。二是中国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强劲，同时，长期以来智利高度重视并开拓中国市场取得较好效果。三是中智两国农业生产具有季节互补性，智利农产品供应期时逢中国国内农产品相对稀缺的冬季市场，这为中智双边农产品贸易奠定了良好基础。四是

2019 年中智自贸协定“升级版”生效实施，2021 年两国签署关于智利冷冻水果输华检验检疫要求的议定书，均进一步为智利对华农产品出口提供保障与便利。

《21 世纪》：结合农业互补性、当前粮食安全形势等因素，您对两国在农业和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合作前景有何见解？

牛清报：智利是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大国，中国是智利农产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两国农业和农产品贸易合作基础良好。双方应进一步从战略角度推动农业互利合作，携手应对挑战，保持农业稳定发展，增强农产品供应链韧性，积极促进国际粮食安全和农业技术合作，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3 中企在智投资呈现“大规模、多元化”特点

《21 世纪》：2018 年 11 月，智利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两国经贸往来所起到的作用？

牛清报：智利是中国在拉美“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两国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定位高度契合，双方制定相关规划，打造合作平台，引领后疫情时代双边各领域全面发展。两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各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政策引领、设施保障、资金便利和民意支持。中智贸易得益于“一带一路”合作的同时，也将推动中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

《21 世纪》：在“一带一路”倡议等提振下，中企陆续赴智利投资。近年来，中企在智利投资整体呈现出什么特点和趋势？

牛清报：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因素提振下，中企在智利的投资整体呈现“大规模、多元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投资数额大、建设速度快、科技含量高、涉足领域广、发展后劲足。在智中资企业积极参与智电力、通信、基础设施等多领域投资，多个大型项目落地，为智利后疫情时期就业增长和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

《21 世纪》：智利 5 号公路塔尔卡-奇廉段特许经营项目是中资企业在智利中标的首个公路 PPP 项目，标志着中国企业成功进入智利基础设施特许经营领域。能否谈谈此项目对于中智合作以及当地发展的意义所在？

牛清报：当前，智利 5 号公路塔尔卡-奇廉段两座主收费站已投入试运营，受到一致好评。智利 5 号公路塔尔卡-奇廉段特许经营项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是中智合作的一抹亮色，也是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该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为助力智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起到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发展、提高民生水平的成效。

《21 世纪》：您如何看待中智“一带一路”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能源、矿产等领域有何进一步挖潜的合作空间？

牛清报：中智两国元首在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晤，就加强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领域务实合作，挖掘合作新动能达成广泛共识，为包括两国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在内的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坚强的政治引领，注入强大动力。下一步，中智双方将积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深化经贸、投资、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拓宽双向投资合作领域，在密切农业、矿业、交通、能源等传统领域经济合作

的同时，挖掘公共卫生、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新动能，共同开发新的合作增长点。我相信，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将再上新台阶，造福两国人民。

4 中国加入 DEPA 将成双边合作新的推进器

《21 世纪》：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国、智利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净零排放目标。智利政府 2020 年正式推出绿色氢能战略。考虑到中智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各自具有的优势和互补性，您对两国围绕可再生能源可展开的具体合作有何看法？

牛清报：智利地理位置特殊，长期以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2019 年，智利政府制定了《2050 年碳中和计划》；2020 年，智利政府公布《绿氢国家战略》等新能源领域相关配套规划，争取在 2030 年之后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主要供应国之一。展望未来，中智两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智利南部地区拥有充沛的风能资源，北部拥有高时长、高强度的太阳辐射，加之政府支持新能源产业投资和发展的优惠政策，综合营商环境较好。中国企业可凭借自身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的技术和装备优势，与智太阳能和风能资源对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助力智利实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以及“绿氢”抱负，造福智利社会与民众。

《21 世纪》：2022 年 8 月，根据《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联合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正式成立，全面推进中国加入 DEPA 的谈判。您如何看待中国加入 DEPA 的前景？中国加入 DEPA 对中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各自发展有何益处？

牛清报：2021 年 11 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DEPA。2022 年 8 月，经过成员国认真评估，DEPA 联合委员会决定同意成立中国加入工作组。智利是 DEPA 的创始成员国，也是中国加入 DEPA 工作组协调国。中智两国元首会见时智利总统博里奇明确表示，智支持中国加入 DEPA。我对中国加入 DEPA 前景充满信心。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正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加入 DEPA，有利于推动数字贸易领域扩大开放，与成员建立起规则相通、标准相容的一体化数字贸易市场，有利于扩展与各国在新兴数字领域的互利合作，为企业带来数字产业合作商机，促进各方数字经济发展。中国积极推动加入进程，也将增强 DEPA 作为更广泛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影响力。我相信，中国加入 DEPA 将成为双边经贸合作新的推进器，促使中智企业在 DEPA 框架下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双方企业和人民带来更大福祉，共同为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舒晓婷

来源：《21 世纪经济报道》2022 年 12 月 6 日第 005 版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指标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正在砥砺奋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道路。为更好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解和把握其概念内涵、发展路径以及测量指标是关键。

1 理解现代化的概念内涵

要理解何谓“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楚何谓“现代”以及何谓“现代化”。在社会学领域，“现代”是指与传统中世纪社会不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并非纯粹的时间或时代概念。“现代化”，是指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是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上，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主要内容，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

在“大社会”的视角下，现代化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不是某些指标的堆积，是一种与前现代社会发展相比独具特色的发展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不能把它的“传统”与“现代”绝对割裂，相反，只有在本国家、本地区的发展传统基础上充分运用当下发展的特点和优势，扬长避短地推进现代化道路才能最终取得成功。然而，由于现代化作为社会变迁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形态，率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并在经济水平上表现出了相对较高的成果，为此有学者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其他一切国家社会现代化的“典范”，提出了现代化的西方化，即无论历史经验、社会现状、发展起点有何不同，各个社会都将按照西方的发展道路，展现大体相似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比如，美国经济学家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经历他总结发达国家经验所提出的六个阶段，即传统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只有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式和路径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不过，部分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失败事实深刻表明，这种观点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现实，并没有真正理解何谓现代、何谓现代化。

实际上，现代化并非只有单一的经济维度，在探索如何实现现代化时不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角度。发展社会学家胡戈维尔特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社会中个人的价值观念以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导致的结果，社会经济增长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共同构成社会真正的发展”。现代化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参照或遵循，发展中国家只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照本国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历史反复证明，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西方模式，不是水土不服，就是成为他国附庸。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提到：“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 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

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需要基于对比分析，通过了解什么是“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从而理解为何我们正在实践的是“中国式”且有别于西方式的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式的现代化存在不同。关于西方的现代化路径，马克思曾就对外贸易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即西方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正是因为它剥夺了第三世界发展的机会，而第三世界又以其不发达状态帮助了西方的发达。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历史观为理解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极佳的方法论路径。

分析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可以发现，除了西方发达国家本身的科技发展、社会出现手工业者阶层、基督教新教徒的道德观念等内在动力外，他们实现现代化的必需条件之一，是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财富几乎是无偿地转入了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不发展的理论”中，强调欧洲各国经济之所以能扶摇直上，就在于通过殖民式的或者说不平等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爆发式的经济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大都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又用它们完成了工业投资，进而为工业革命乃至现代化提供了必需的条件。在西欧通过掠夺海外的剩余产品进而取得社会和经济上的长足进步的同时，与西欧进行贸易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却由于全面地丧失了剩余产品而被剥夺了经济发展的机会，在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中出现人口下降、经济衰退、政治退化等现象。

在这一点上，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与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明显不同。在人口规模巨大、自然资源禀赋差异大、地区差别明显的特殊国情下，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范本可学，在不断尝试摸索、学习创新、实践纠错、合作发展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本国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发挥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团结奋斗、合作创新的传统和特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标，以全中华民族为行动主体，以守正创新为发展原则，面对“两个大局”，逐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导下坚持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社会水平、文明水平、政治水平、生态水平等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平衡发展、“一带一路”等多项重点项目和战略的完成或积极推进，都显示出中国的现代化既具有其他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点，更逐渐展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五大特点。

3 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评估指标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我国使用甚广的现代化评估指标体系是“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直至 21 世纪初谢立中对该指标体系进行了溯源式澄清，提出国内专家学者应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客观的描述与分析。不过，虽然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评估体系，但仍内含于既有现代化理论之中，且存在两大有待完善的技术不足：其一，在社会指标的选择和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尚未达成共识；其二，无论是英格尔斯的现代化指标（拉西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都是分散型指标，并不适用于综合性评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开始走向“创造现代化”的新阶段，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更是为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新可能。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和表达中，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特征及其所蕴含的“现代”元素和“中国”因素，已经形成较为明确和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他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大特征，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评估指标提供了参考方向。

分析五大特征不难发现，它们涵盖了当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几大领域的内容，并为每个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内在的评估参照点。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实现这样巨大人口规模的现代化，无论是难度和挑战还是其世界性意义都前所未有的，基于此需考虑评估人的现代化、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需考虑测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评估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与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这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天性弊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需评估全国的物质发展水平，更需评估全民的精神发展水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避免了西方工业文明的生态危机，需在生态文明领域评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评估生态系统的循环与平衡，评估生态总价值。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走“国强必霸”、战争掠夺和对外转嫁发展代价的西方现代化老路，需评估维护国家与国际和平稳定的各项措施，如可维护世界和平的举措、对外援助、维和次数与人员等。

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成功探索，是不同于任何一种既有现代化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在吸取世界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走一条创新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为讲好中国故事、提炼中国经验供世界参考，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阐述，并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评估指标。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理应成为当前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作者：邹宇春 兰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30日第005版

从学科分野看经济史研究现状与未来

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科学”尺子来度量社会科学，那么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历史学是最不“科学”的，而经济学是最“科学”的。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经济史研究中学科和方法之间的张力较其他专门史更为显著和持久。长期以来，前辈学者一直致力于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融合二者，吴承明、李根蟠、杜恂诚、李伯重等先生也曾从方法论角度作过探讨。近年来，两种方法的结合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优秀的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很少有完全不借助经济学方法、概念的，也很少有在历史背景、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方面有明显缺陷的。比如，曹树基教授是历史学出身，但在他的研究中，就经常用到经济学的概念和框架。在研究地权时，他构建了一个一般理论：把所有权分为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并以此为基准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产业交易方式，即卖（绝卖）、典（活卖）、押租（顶）、抵押（当）、质押、普通租佃、永佃等，依据其性质和权利转让关系进行了分类。彭凯翔教授是经济学出身，

但在他的研究中，对于史料的挖掘、整理、解读都非常深入细致。在研究传统中国民间交易行为时，他对《宁波钱业会馆碑记》和“石”“担”等的考释非常精到。更重要的是，在论证过程中，他能借助经济学的方法来验证、辨别传世文献的记载，并对文献记载中混乱、矛盾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在对度量衡和价格信号形成的研究中，他会自觉地将自己提出的解释框架、论证结构与具体的历史情景相结合，以检验其可信性。

这样的研究实践，对于经济史的推进显而易见。但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两种方法的“分庭抗礼”乃至相互排斥的现象，仍然是一种常态。即便是在当下，要求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同时具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良好训练，依然是一个过高的目标。但对两门学科都有基本了解，并能较为准确地解读不同学科的研究文献，借鉴其问题意识、研究思路、论证方法和结论等，应该成为新一代经济史学者的基本要求，而这也是两种方法深度融合、相互借鉴的基础。但在经济史学界，还存在很多误读，乃至因为不能理解而完全无视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情况。因此，这就需要对两门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加以比较梳理。这篇短文当然不足以系统梳理两个如此庞大的知识体系。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都有很多分支流派，本文也无力一一细究。本文从一个研究者理解文献的角度，基于笔者近年来目力所及的较为常见的一些文献，谈一点阅读体会。

1 “分庭抗礼”的经济学与历史学

首先，就研究目的而言，经济学侧重于发现和证实因果关系，而历史学重视历史事实的还原，以及对历史变迁的描述。当然，经济学也有还原历史的诉求，历史学也会探索事件之间的因果和相关关系。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两个学科各有侧重。从因果关系的研究来看，经济学主要基于模型和数据，寻找数据间统计意义上的“关系”；历史学则注重寻求文献证据。一般来说，经济学更倾向于寻找具有一般性的因果关系和规律，而历史学有着“反理论”“反一般性”的先天属性，历史学家认为“一事一议”式的因果关系更符合实际。也正因此，经济学多用演绎法，而历史学则更青睐归纳法。从事实还原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历史学多是“记述事物本身发展的过程并解释其合理性”，那么经济学更在意“指出事物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并强调现实的不合理性”。

目的和方法上的差别，导致二者在选题和论证方法上的不同。以事实还原的论文为例，哪些事实是值得重视的，是学术价值更高的选题？对经济学来说，只有对理论有意义的事实才是重要的。经济学认为，人类认识世界，必须借助某种“理论”，就如同只有借助地图，人们才能理解地形地势的变化，尽管地图必然会丢失很多信息。如果非要强调“眼见为实”，那我们只能坐井观天，只能看到目力所及的山川。因此，只有当事实有助于改进我们认识问题的方法、理论，改进我们的“地图”，才是有意义的，值得去研究。在经济学家看来，离开理论是无法认识世界的。正如科斯所说：“事实需要筛选，其重要性需要评估。如果没有合适的理论指引，我们既无法挑选事实，更无法评估其重要性。”

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借重的常识、史感，其实也是一种“理论”，只不过相对初级一些。对历史学而言，只要是前人没有发现的事实或前人说错了的事实，都是有价值的。任何基于先入之见的理论，所“发现”的事实都是片面的，都是对真实世界的误读。“地图”不仅不能帮助我们，反倒成为误导和阻碍我们看清自然的“障眼法”。如果极端一点说，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历史都不能脱离其存在的具体情景，只有重建研究对象的来龙去脉，关注到影响研究对象的所有因素，才能完整地解释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且这种解释也仅仅适用于这一

单独的历史过程。当历史学研究者强调“历史是复杂的”时，大多是在这个意义上的。

也曾有过富有雄心的历史学家不满意来自社会科学的理论，尝试通过不断积累不同层面、不同局部的研究，希望最后用归纳的方法得到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理论。但这更像是历史学家的托词，现实中很少有成功范例。熊彼特说：“（历史学派）并没有根据其历史研究提出任何经济理论，至多说明过去是由狩猎—农业—工业发展而来，即使这切合实际，也没有规律（理论）意义。”也许钱德勒的“看不见的手”等屈指可数的例子可以勉强算得上某种理论（钱德勒通过对美国企业史发展历程和大量案例的归纳分析，得出了和科斯的交易费用大致相当的结论）。

就论证方式来说，经济学通常借助还原主义的方法，也就是对一个复杂的事物或现象，通过不断分解或者不断抽象，尝试找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或者导致某类现象的共同的“底层逻辑”。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假设、检验、模拟受控实验等，寻找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进而揭示表面现象背后的真实世界。因此，经济学会用逻辑和数据之间的关系代替对真实世界的直接描绘，因为前者更客观，更具有一般性，因而也更“真实”。

历史学则用尽量贴近事实的文献来重构过去，所以格外重视文献的可信程度。在论证时，历史学家比较重视事物、现象的先后变化。一种制度、一个现象，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先发生的事情如何对后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这是历史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时，历史学家一般也不排斥对于人物心理、动机的揣测，有时这种揣测还会成为解释历史的关键，这一点也是经济学家比较排斥的。

在论文写作层面，经济学论文成熟但较为僵化，崇尚以标准化和模板化的写作来减少歧义；历史学论文虽缺乏严谨的规范但富于启发性，讲究写作技巧，甚至高明的作者会给读者以暗示，让读者从作者的叙述当中自己领悟，不同的读者会受到不同的启发。在这一点上，优秀的历史学著作类似艺术品。这也是我们在阅读不同类型的文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历史学与经济学有可能相互借鉴，推动经济史学的发展。这一点已有的优秀经济史研究成果可以证实。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相互借鉴，可能也会有助于历史学与经济学克服自身的方法论危机。

2 理解是借鉴的基础

正如前文所述，短时期内培养出同时受过经济学和历史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是不现实的。目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之间相互学习和借鉴，而学习和借鉴的基础就是正确地理解来自不同学科的文獻。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会发现经济学的研究看起来更科学，但其提供的，对于历史学想要理解的完整的真实世界而言，只是一个“地图”，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众多可能性之一。因此，对历史学背景的经济史研究者而言，阅读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论文，要重点关注的并不是其结论是否成立，是否符合历史“常识”，而是其所指示的路径和他们提供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就路径而言，比如，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通常能够发现间隔时间较长或者在地理上相隔较远（通常不隶属于同一个政治或者统计单元）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这是历史上那些基于经验常识的文献资料难以提供的。对历史学家而言，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像是一种猜想，其能否被接纳到历史的撰写和叙述中，还需要历史学家循着这些线索去寻找更切实、更符合历史学证据规范的资料。

就分析而言，对于研究历史上的某种经济现象或者事物，经济学能够提供多种框架和分析工具，使得我们可以将研究对象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不同的环节、侧面，这是历史学所欠缺的。比如，研究历史上的企业，经济学可以提供产权、委托代理关系、激励机制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将其作为一个组织，研究其决策、战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等。这些概念、关系、框架不仅适用于当下的企业，也适用于历史上的企业，我们可以借助其更深入地解释历史上企业的行为及其演变。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吴承明先生一再提倡的“史无定法”：所有的经济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只是一种方法。

对经济学背景的经济史研究者而言，历史学的经济史研究成果，并不仅仅提供历史背景和数据，尽管大部分的历史研究成果正在被这样对待。历史学家撰述的历史上的经济现象，通常要比经济学理论描绘的理想形态更为复杂。因为，历史学家在探索这些经济现象之初，并没有带着经济学这个“地图”，他们发现的问题、关注的焦点，往往会无视经济学理论的前提假定，或者提供不同寻常的案例。对经济学研究而言，这些或许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有可能为经济学的发展和突破提供某种可能性。由于历史几乎是无限的案例库，我们可以从中不断发现新的关系，甚至观测到某些在当下的世界中无法进行的“实验”。

如果历史学家的研究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同吴承明先生说的那样，经济史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与当下的世界有着很大差别，要深入理解历史上的概念、制度、数据，要足够耐心和细致，而不能仅仅指望历史学家来告诉经济学家答案。进入这些历史细节，去了解表面相似的经济现象、概念背后的细微差别，经济学家一定会有所收获。经济学家抱怨历史学家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后，却回敬经济学家“同样一碗粥”，但很少有人愿意俯下身来，深入研究这些复杂的历史细节。

正如科斯曾经精炼总结的那样：“理解经济系统运作的过程，来自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理论建议经验研究的方向，而随后的经验研究则对理论的修订抑或重新思考提出建议，反过来推动了新的经验研究。在正确的方式下，科学研究永无止境，而每个阶段都提高我们对经济系统的理解。”

3 有利于化解方法论危机

对于经济学和历史学而言，当前都面临着巨大的方法论挑战：对历史学的真实性的否定和对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

对历史学真实性的否定主要来自后现代史学。在后现代史学看来，一方面，历史学家赖以还原事实的史料不过是一种经过语言表达的、被有意识创造的“文本”，这些文本必然是对事实的扭曲。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中，不可能根除主观偏见，或者研究者兴趣、价值观的影响。专业的历史学学术训练和研究规范，只能在程度上减弱这些影响，但无法完全排除。极端者甚至认为：所有的文本解读都是误读，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与虚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

对经济学研究者而言，科学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指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因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有着本质区别。“人的特性致使了机制和经验现象在社会产生了多对一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个解释机制。”不像物理现象那样只有唯一的解释机制。经济学家通过演绎方法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结论，也必然不同于科学家的结论之于自然界，经济学家的结论通常都是与经验现象不一致的。进而，“任何系统性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还是进步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

更严重的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虽然未必“真实”，但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进而参与对未来的创造。社会科学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某件事情、某种规律之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其具备充足的客观理由，而是因为相信它会发生的人足够多。

经济学和历史学方法的深入借鉴，或许有助于化解这些质疑。曹树基教授最近提出的“内史化专门史”研究思路，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尝试。曹教授认为，与此前的专门史研究相比，内史化专门史“更侧重于从各个学科知识体系中提出问题，更侧重于应用各学科的专门知识解决问题”。尽管曹教授认为这种研究思路并不比传统的专门史研究更具优势。

无论如何，正如科学哲学家怀海特指出的那样：“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有注重实际的人，他们只承认‘不容置疑的既有事实’；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和任何时候，还有深受哲学诱惑的人，他们致力于普遍真理。正是对事实细节的强烈兴趣与对抽象概括热烈追求的结合，才是我们现今社会一切新知的来源。”历史学、经济学都根源于人类追求新知的内在冲动，二者的差别乃至某种程度的对立，也许会长期存在，但这种差别不应成为相互无视的原因，而应成为相互借鉴的动力。只有如此，经济史研究才有可能对历史学、经济学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高超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欠发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1日第005版

加快构建国际大宗商品治理体系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经济发展中外部冲击的影响作用，“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冲击”，尤其需要解决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定价权缺失”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强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紊乱、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能源供应紧张等风险相互交织，加剧了经济复苏进程的不确定性”，倡议各国积极应对这些不确定性，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

近年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以及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等因素加剧了大宗商品市场的供需失衡问题，大宗商品市场随之发生剧烈的波动。在过去十多年间，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波动下自身经济的脆弱性不断暴露出来。总体来看，我国关键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这种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具有混合的经济效应。对于一些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对国内市场具有直接的影响；对于一些自给率高的商品，外部价格冲击容易吸收；对于我国供应国际市场的大宗商品，具有应对国际市场不利的价格冲击能力。

1 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经济效应

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助推宏观经济波动在国家间跨境传递，同时，不适当的经济政策会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范围内，一些发展中国家属于典型的资源依赖型经济，这些国

家具有单一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或者依赖于一种大宗商品，或者依赖于有限的大宗商品组合。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对国内经济治理带来直接挑战。考虑到我国经济部门具有多样性，市场具有活力，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剧烈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有限。近些年，经济学研究也表明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衰退效应并不存在。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富有成就的经济建设，我国经济具备行稳致远的内生能力。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五年保持在 25%左右，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第一大经济增长引擎。我国货物贸易额和外汇储备稳居全球第一，消费市场规模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具有全球范围内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完善的工业行业部门，拥有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工业中类、666 个工业小类，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激增的现实背景下，我国经济不会出现“资源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典型经济难题。但是，国际价格剧烈波动的经济影响和潜在风险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和市场参与者重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经济效应具有非对称和非均衡的特性，这将给政府经济政策治理带来额外的挑战。对于发生在一国内部的价格波动，政府具备直接而有效的政策手段和工具。然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获益的国家与受损国家不具有共同的社会福利目标，受益者和受损者在空间甚至可能在时间上是分离的，无法通过国内直接的平衡政策予以应对。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突出地体现为通货膨胀效应。由于大宗商品主要属于原材料或生产投入品，当期的商品价格上涨很难直接体现在当期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中，常常具有滞后性。我国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和服务篮子具有自身特点，同时国际市场上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传递具有从 PPI 到 CPI 的传导机制的特征。可以说，短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消费者物价水平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本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企业 PPI 通胀影响的中长期效应需要引起关注。

首先，微观主体将面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首轮效应。按照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并不是完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最终从 PPI 通胀到 CPI 通胀的程度取决于产业链条长短和范围大小。大中型企业出于维护稳定的客户关系以及受中长期契约的影响，常常会在短期内用企业盈余吸收部分价格上涨影响，但是持续的而剧烈的价格上涨压力注定会通过产业链向外传递。

其次，应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能力存在差异。一些中小型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低，又多处于产业链的中下游，议价能力较弱，对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吸收能力不强，会面临生产经营问题。以铜、铝、钢材等金属以及原油为基础原材料的电机、电器以及化工中小企业，在原材料价格冲击下利润空间快速缩小。

最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烈上涨叠加着疫情不确定性以及供应链风险等因素，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中，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会在整个生产网络中传递，产业链断链问题不容忽视。

在宏观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会带来通胀风险，而且还会给我金融市场带来直接的冲击。在学术研究领域，近些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备受瞩目的现实情况下，国际金融市场上避险资本在逐利本性驱动下，会以多种方式流入我国金融市场；另一方面，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既是重要的需求方，也是关键的供给方，上述供需双重结构特点会促使与商品密切相关的上市企业在金融市场的绩效出现分化。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情况下，我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将有所提高。总体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剧

烈上涨对我国金融市场带来的短期影响效应取决于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

2 健全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工具

从世界经济现实运行情况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活力,经济韧性突出,国内市场巨大,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政策工具充足。从中长期角度看,应对外部冲击,我国应注重考虑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从宏观经济治理目标着手,确保物价稳定,事关民生福祉。积极应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保障基础产品供应安全将成为应对外部价格冲击的工作重点。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会直接影响我国的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此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过快,通过 PPI 渠道加速了我国企业成本的上涨,这将压缩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要持续强化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稳定就业,通过有效的金融政策助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

其次,注重发挥我国商品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促使商品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实现良性互动。当前,我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成交周转率高,持仓时间较短,高度投机性质突出,这与个人投资者的高参与度密切相关。投机活动密集度高,会增加市场的波动性,同时也会挤占套期保值的交易活动。要通过期货合约优化,加强监管,拓宽产品类别,大力促成我国商品期货市场深化发展,推动我国与大宗商品运营密切关联的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实现“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

最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影响中国股票市场。商品市场和股票市场提供了当前广泛交易的两类金融产品,随着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属性不断加强,大宗商品市场与股票市场联系更加紧密。为了避免金融市场风险,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需要对商品市场价格异动与股票市场波动的情形加强监管,避免金融领域累积风险与实体经济部门运营风险的叠加效应,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动态:影响因素、效应及政策分析”(716732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张天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3日第003版

积极应对大数据伦理问题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云计算等的数据挖掘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应对复杂局势、制定科学决策、提供优质服务等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特优势,这使得大数据的重要性越发突显。与此同时,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在隐私保护、数据中立、数字鸿沟等方面带来了一些新的伦理问题。积极应对大数据伦理问题,使相关技术的道德意义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促进人类整体福祉的发展,是我们对大数据进行伦理反思的关键。

1 把握具体问题

大数据相关技术在提高生产生活效率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被快速数据化。而在对数据的生产、收集、挖掘、使用等过程中，一系列大数据伦理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是隐私保护问题。大数据伦理面临的一大困境是，相关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应用，要以开放共享为基本理念和规则，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个人隐私及安全保护方面的伦理难题。从伦理学的角度讲，隐私即在私人生活中的不愿诉诸公众社会或为非所意愿的他人知悉、干预的情况和事态。由此可见，个人隐私主要涉及私人领域与公众领域之间的界限划分问题。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隐私伦理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在个人信息收集方面，隐私风险的产生主要来自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等对个体行为的实时监控，而这主要是因为监控对个人信息的收集过程往往是不为被监控个体所知道的。比如，学校、医院、政府、企业等各种平台收集的学生、病人、公民、消费者等的各种数据，是否侵犯了他们的个人隐私？此外，对海量碎片化的个人信息进行积聚、对比、分析等处理，也有可能造成对个人隐私的威胁和伤害。原本各种分离、无关的小数据，经过加工、重组、编辑等一系列处理过程，其自身价值会产生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变化，同时其组合构成的大数据也可以描绘出个人的特性、身份、习惯等，而这里就很可能有人们并不想公开的个人隐私信息。

二是数据中立问题。数据是可以由人工或自动化手段进行处理的那些事实、概念和指示的表示形式，是进行各种计算、研究或设计所依据的数值，包括数字、字符、符号、图表等。大数据本身虽是客观中立的，但在数据处理及使用中也可能产生非中立的结果，而这主要是因为在此过程中存在着各种人为主观因素。在全球数据爆炸性增长的今天，正是由于人们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有所偏差，才会导致算法歧视等伦理问题不断出现。比如，算法推荐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而日益成熟，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偏见与歧视的伦理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像一些网上购物平台中的“推荐”页面或赠送“红包”“优惠券”等，通常都是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得到的。从本质上看，算法设计是具有目的性和价值观的，它体现的是设计主体的意图和选择。因此，算法基于对个体的贫富差距、性别差异、健康状况等信息的全面掌握，可以个性化、差异性地推荐相关产品或服务，但也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在信息掌握层面的不公平，甚至出现“大数据杀熟”等算法歧视现象。

三是数字鸿沟问题。数字鸿沟是数字化时代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公平问题。传统意义上的数字鸿沟，主要是指人们在数据可及、数据应用、数据分析等方面存在着使用数字技术的巨大差异，表现为一部分群体能够较好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但另一部分群体则很难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数字鸿沟产生的数字技术资源分配不平衡问题，会逐步引起群体矛盾和社会不公。在大数据背景下，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数字鸿沟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公平问题，不再主要表现在数字技术的可及和应用方面，而是日益演变为数据鸿沟，并集中表现为由知识、技术、经济等因素导致的技能鸿沟、价值鸿沟等。一些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构等，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和使用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挖掘、计算、存储、传送等掌握社会中的个体行为，而普通民众则很难获得庞大的高质量数据。再者，即使民众成功获取了大量的高质量数据，也有很多人并不具备分析各类复杂数据的技能。由此，这里的数字鸿沟将越来越大，在数据获得、技术应用和价值区隔等方面出现了不公平的伦理问题。

2 探索应对之策

面对大数据带来的伦理难题，我们应积极采取有效管理措施，确立相应伦理原则，以寻求各种挑战与难题的应对之策。

一是加强数据管理。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的管理，不是简单对技术从业人员的约束与监管，而是需要进行多层面、全方位的系统化管理。首先，应加强对数据使用者的管理。要加强数据使用者对大数据相关技术知识的学习，使其在深刻领会的基础上应用。要提高其个人隐私保护观念，防止出现个人隐私泄露，并使其学会依法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要对其加强数据伦理教育，全面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其次，应加强对技术的控制管理。由于海量数据在收集、处理、分析等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隐私侵犯问题，所以既要加强对个人信息收集及存储环节的隐私保护，又要采用有效合理手段限制数据分析和非法传输，还要加强信息安全技术对隐私安全的保护。实际上，解决大数据带来的隐私保护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推动技术不断发展与进步。最后，应加强对数据环境的监督管理。要坚持德法并举，为大数据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制度环境，强化数据使用者的内在自我约束。要坚持全民参与，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充分发挥举报制度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中的积极效用，从而维护良好的数据生态环境。

二是注重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所追求的社会进步归根到底在于人本身的发展。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明确将“增进人类福祉”作为科技伦理的第一条原则，强调“科技活动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数据相关技术的发展，应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大数据作为现代科技手段，其不断发展进步的意义和目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更好地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强调，“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我们只有始终把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把技术作为对象性的存在，才能确立人在大数据相关技术开发应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科技发展成果，积极引导科技向善，增进人类的整体福祉；要尊重个人隐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公平正义地对待不同社会群体，避免歧视与偏见。

三是秉持价值理性高于工具理性的原则。工具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道尔诺（Theodor Adorno）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亦称技术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理性作为纯粹的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由于自身的辩证发展而变成了达到实用目的的手段和奴役人的工具。工具理性代表着可怕的科学技术统治，会扼杀人类理性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它所主导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考虑的是效用和效率，而往往不会去考虑伦理道德上的善恶问题。与工具理性不同，价值理性本身蕴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看重的是主体的内在需要以及行为本身的价值，而不是行动的结果。工具理性讲求效率和效能，更多关注的是人类的物质欲求；价值理性则追求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智慧与价值良知。虽然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面临着工具理性崇拜、价值理性边缘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工具理性为人类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两者辩证地统一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在大数据背景下，我们应在继续重视工具理性的同时，不断弘扬价值理性，充分发挥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引领作用，以促进社会更好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李文涛（南京大学哲学系、智能哲学与人类未来发展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9日第006版

创新中国的国际规范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加深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日益频繁，在参与国际机制过程中逐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探索如何建立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规范，对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在物质基础方面的巨大变化、国际制度的显著变革等都有丰富研究，但对中国在国际规范变迁中的作用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就国际政治学科而言，从中国与国际规范塑造的角度来理解和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思考路径。有学者谈道，如何更好地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变得日益紧迫。面对已有的国际规则，中国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主动了解、适应、掌握和运用。一方面，对既有国际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如在 WTO 谈判、联合国改革、气候谈判、世界银行份额分配等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中的发言权和利益。另一方面，针对全球治理规则的供给不足，积极主动提供全球治理的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并不只是量的增加，而是超越已有模式的创新引领。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创建，在制度安排上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性，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规范创新提供了新的经验。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要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对国际规范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使现有国际体系的运作更加顺畅、包容更多元化的力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规则不应只由西方国家说了算，而是大家商量着办。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这实际上是中国以自己的积极进取和主动作为，通过提出新倡议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改变自己也是在影响世界。当前，国际规范研究尽管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一元的线性研究范式聚焦的是规范产生、扩散和内化的路线图，这种范式排斥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行为体，尤其是非西方国家行为体在规范重塑中的作用。国际规范研究的西方话语霸权压缩和遮蔽了非西方话语的发展空间，低估了非西方国家在规范重塑上的作用和影响。旧有国际体系主要由西方国家主导，国际规范更多地打上了西方国家的烙印，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规范的话语权完全由西方国家掌握。事实上，中国在推动国际规范的发展和创新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的时候，中国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就积极致力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广和拓展，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形势，不断丰富其内容，贡献了自己的价值理念。中国共产党人运用“一国两制”创造性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这一方式无疑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主权内涵的创新和发展，为国际社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借鉴。此外，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重塑中积极实践，并没有成为人权规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与西方国家的对话争论中，从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阶段出发，从发展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出发，赋予了人权概念更多的丰富性内涵。

物质力量和观念塑造是一个世界大国行稳致远的支点和根基。中国不仅向世界提供物质性公共产品，还有观念性公共产品的贡献。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准则，开启了国际合作的崭新篇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包容性、普遍性和多元性，与一些西方国家提出的“民主价值共同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新型大国关系倡导的是一种有别于以往的大国相处之道。这些创造性新理念的提出，是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实践的结晶，既有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也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和引领，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在国际规范创新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一个需要挖掘的领域和亟待开拓的研究议题。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已不再是一门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正在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改变了“西方是核心、非西方是边缘”的文明等级观、对立观和标准观，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共存，为未来的国际规范创新赋予了更强大的动能和空间。挖掘中国重塑国际规范的机制，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探索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推动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应有之义。

作者：袁正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1月29日第001版

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深入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二十大后党中央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今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系统部署了2023年经济工作。中央财办有关负责同志接受新华社等媒体记者提问，围绕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应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1 明年我国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

问：如何看待明年我国经济走势？

答：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从国际看，乌克兰危机延宕发酵，全球贸易形势不容乐观，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粮食和能源安全问题突出，世界经济可能面临滞胀局面；从国内看，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经济社会风险点增多。

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资源要素条件可支撑。综合研判，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而我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一是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将给经济恢复带来重大积极影响，预计明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会加快恢复，经济活力加速释放。二是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叠加发力。今年已经出台实施的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结构优化政策，该延续的延续，该优化的优化，政策效应将在明年持续显现。明年还要根据实际需要陆续出台新政策、新措施。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同向发力，将积极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三是基数效应。今年经济增长低于预期，客观上造成今年经济基数相对较低，明年只要经济恢复正常增长，基数效应将对明年经济数据形成一定支撑。

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和风雨如晦的外部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但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实现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问：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在哪些方面发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答：明年的宏观政策框架可概括为五大政策加六个统筹。

五大政策就是财政、货币、产业、科技、社会政策。对财政政策的要求是加力提效，明年要适度加大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提高政策效能，更好发挥财政撬动社会资金的杠杆作用。对货币政策的要求是精准有力，货币政策力度要够，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投向结构要精准，尤其要支持小微企业、

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总的看，财政加力、货币有力，就是要确保社会总需求得到有效支撑，从而使得社会总供求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和质量上取得平衡，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当然，产业、科技、社会政策都非常重要，要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1+1>2”的效果，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六个统筹具有很强的年度针对性和问题导向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很多两难多难问题，要在多重约束下求得最优解，必须强化系统观念、守正创新。其中关于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随着党中央决定优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的实施，预计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会加快恢复，这将释放出巨大的活力，促进经济循环起来、运转起来，加快向潜在增长速度靠拢。

问：随着优化防疫二十条、新十条落地，各地感染数量在不断上升，如何应对感染数量增多对经济的负面冲击？

答：疫情暴发以来，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我们用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有效应对了全球五波疫情冲击，有效处置了国内 100 多起聚集性疫情，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有效守护。过去三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4.5% 左右，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抗疫和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过去，在重症率、致死率高的情况下，我们严格防疫是必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当前，病毒传染性强，但重症率、致死率显著降低，疫情防控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而且我们利用这几年时间加强疫苗和药物研发应用，提高疫苗接种和医疗保障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审时度势，科学优化防疫措施也是必要的、正确的、负责任的，都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按照党中央部署，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加强统筹衔接，有序组织实施，顺利渡过流行期，确保平稳转段和社会秩序稳定。平稳转段既是对公共卫生提出要求，也是对经济运行提出要求。实现平稳转段必须做好过渡期管理。为应对短期内感染数量增多造成的冲击扰动，当前关键是做好三件事：一是更好保障群众的就医用药，不出现大范围的医疗资源挤兑。二是保障产业稳定运行，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不能中断。三是要做好药品、重要民生商品的保供稳价，不能出现断供或价格大幅上涨。总之，困难是现实的、暂时的、难免的，要精心做好过渡期管理，曙光就在前面。

2 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

问：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加强需求侧管理，找到二者结合点？

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的主线。同时，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都是为了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长期增长潜力。当前形势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应该有利于扩大总需求，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同时，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应该有利于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从而实现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

当前经济工作中有很多领域，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的结合点，既能够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有利于扩大当期需求。比如，我们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加大新领域新赛道的投入。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就是典型成功案例。再如，今年不少南方省份由于干旱高热出现缺电现象，而在东北、华北、西北一些地方又有大量风电光电无法消纳，加大在电源布局、跨区域电力输送、智能电网等方面投入，既扩大当期需求，又提高能源体系效率，为未来的需求增长和能源转型创造条件。可以说，经济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空白点，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结合点。只要我们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采取适当的政策引导，就能够使这些结合点变成经济的增长点，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问：当前，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消费，如何有效稳定消费增长？

答：针对这几年受疫情影响，老百姓收入增长放缓、预期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存钱避险倾向上升的情况，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采取强有力措施，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增加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提高消费倾向高、但受疫情影响大的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适当增加消费信贷。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

针对住房、汽车、服务性消费等领域存在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要完善消费政策，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服务等消费。如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继续实施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推动汽车消费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等。

3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提振市场信心

问：当前不少企业感到信心不足，如何提振市场信心？如何为民营企业尤其中小微企业创造更良好、更安心的发展环境？

答：当前，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发展预期偏弱，信心不足。会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强调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我国是否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各种不正确的议论，给社会信心和发展前景带来严重不良影响。对此，中央坚决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一方面，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比如，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或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要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依规经营。

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要大力宣传民营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就业、财政税收、科技、创新等具有的重要作用。比如，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重要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

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2021年，民营经济税收贡献已达59.6%，民营企业占市场主体96%，比重进一步提高。可以说，民营经济已成为保障民生、促进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加强中小微企业管理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谋划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依法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恪守契约精神，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让广大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增强长远发展的信心。

问：当前就业形势严峻，如何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

答：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支撑和关键环节。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难度加大，尤其是青年失业率有所上升，这将会是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会议部署，明年要突出抓好稳就业工作。

一方面，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一揽子政策。财税、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实施都要坚持就业优先导向，疫情期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该延长的就延长，该优化的就优化。另一方面，要支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和企业。不断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宽准入、优化政策，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支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通过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等政策支持灵活就业发展。此外，明年高校毕业生将超过115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要重点做好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要加强就业培训，着力改善劳动者素质，提高就业人员与产业结构适配度。

总之，要让产业优化升级中产生的各类就业机会充分释放出来，要让更多市场主体和新就业形态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能够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就业带动能力。

4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

问：疫情加速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答：近几年，受逆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保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遇到很大挑战。这次会议对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部署。

一要坚定战略自信，练好内功、站稳脚跟。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关键是要以守正创新方式办好自己的事。我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潜力最大的内需市场，制造业规模占全球30%，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枢纽。这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坚强保障和最大底气。我们要坚守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这个根本，把各方面的优势和活力真正激发出来，抓紧补短板、锻长板，努力做到更好生存、持续发展。

二要聚焦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基础、加强储备三件大事。要聚焦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要大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物资储备保障能力，多渠道确保供应安全。

三要实现升级发展，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对于传统制造业，关键是加快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提升竞争力，使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更加坚实。制造业高端化不是都去搞芯片，服装家具都可以高端化发展。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是加快前沿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开辟更多引领未来发展的新赛道。对于集成电路等重点

领域，关键是进一步优化产业生态，重视发挥市场力量，大力支持全产业链发展。

四要加强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全球供应链调整是挑战也是机遇。现在欧洲、韩国、日本对华投资增长快，特别是中小企业对中国兴趣大，其中很多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际技术+中国生产+世界市场是很好的模式。要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市场准入，要拓展科技、人才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空间，努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引进用好高端创新人才，吸引更多全球创新要素资源。

问：面对世界经济衰退、保护主义盛行，我国如何更好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和利用外资？

答：外资企业普遍关心自身在中国双循环、自主创新战略中的作用，这也决定其在华经营的长期信心。这次会议对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进行了专题部署，主要有四个方面内容：

一是扩准入。会议强调，国企、民企、外企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扩大开放。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各类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已宣布的外资准入政策要抓紧落地见效。

二是优环境。会议要求，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要主动对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高标准经贸协议，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

三是强服务。会议强调，要针对性做好外资企业服务工作。加强同外商沟通交流，及时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为外商来华从事贸易投资洽谈提供最大程度便利，推动外资标志性项目落地建设。同时，也要推动经贸人员常态化走出去招商引资。

四是抓重点。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新业态发展，保障各类口岸物流运输畅通，多渠道扩大先进技术及设备、能源资源产品和短缺农产品等进口。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加大对重点国别和制造业等引资力度。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5 守牢风险底线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

问：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一些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答：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的重要思路，是做大经济实力这个分母，稀释风险这个分子。从中期看，我国最大的底气在于城镇化、工业化仍处于深入发展阶段，经济需求潜力大、发展韧性强、新的竞争优势不断形成；从近期看，最有力的依托在于保持经济合理增速，推动高质量发展，明年推动我国经济整体好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下一步，按照会议部署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底线思维，标本兼治，短长结合，统筹好化险和改革，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一是关于房地产业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明显走弱，近几个月来出现加速下滑，成为影响经济运行中一个重大风险因素。下一步要立足我国巨大需求空间支撑，持续优化需求侧管理，加大对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的金融支持力度。中期要研究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改革完善房地产相关土地、财税、金融等基础性制度，多渠道增加市场化长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推动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有序构建房地产健康发展新模式。

二是关于金融市场和机构风险。从市场看，受美联储及多国央行高频次加息、市场预期不稳等影响，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国家股市下行、资本流出、汇率贬值等压力增大。党中央高度重视各类市场联动下行风险，在国务院金融委统筹指挥下，抓住主要矛盾，精准施策，近来我国股市、汇率、债市总体保持稳定运行。从机构看，我国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基础较为坚实，但个别中小银行、村镇银行、信托公司等较为脆弱。下一步要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严格高管、主要股东资质审核和行为监管，有效隔离产业资本和金融风险，引导金融机构找准定位，专注主业，不断夯实金融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

三是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近年来，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增速总体放缓，但规模仍然较大，特别是部分地方债务压力不断增大，县市级地方政府债务尤为突出。我们坚持“开正门、堵旁门、化存量、控增量”，坚决禁止变相举债、虚假化债行为，防范地方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平台化，加大隐性债务处置力度。下一步要标本兼治，深化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快建立地方税体系，夯实地方基本财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我们相信，随着明年中国经济整体好转，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各类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会在发展中得到有效化解，重大风险处置能力会在发展中得到不断增强，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一定可以守住，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

问：明年房地产政策的侧重点是什么？如何更好满足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答：这次会议对房地产行业风险化解和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部署。会议认为，各部门、各地方只要认识到位，工作到位，持续抓好，房地产风险可以化解，市场可以实现平稳发展。

一是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的重要性。房地产链条长、涉及面广，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为7%左右，加上建筑业则占到14%；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地方综合财力接近一半，占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6成，房地产贷款加上以房地产作押品的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39%，对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是外溢性较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行业。

二是要做好应对工作，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在前期已出台多项政策基础上，会议从供给端、预期和需求端，以及促行业新模式转型等方面作出部署。

供给端方面。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扛起责任，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继续给行业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推动行业并购重组；完善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及制度。2022年已出台的政策要持续抓好，2023年还将出台新举措，侧重研究解决改善房企资产负债状况等。

预期和需求端方面。要着力改善预期，扩大有效需求，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比如，在住房消费等领域还存在一些妨碍消费需求释放的限制性政策，这些消费潜力要予以释放；结合落实生育政策和人才政策，解决好新老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鼓励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发展长租房市场；合理增加消费信贷，支持住房改善等消费。

三是要抓紧研究中长期治本之策。要深入研判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人口变化、城镇化格局，包括城市群都市圈、城市更新、再城市化等，研究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摆脱多年来“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模式。

总之，要高度重视当前房地产行业的问题和风险挑战，同时要看到，我国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潜力很大。近期密集出台的政策措施将逐步见效，各

项政策措施还将继续完善。

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9日第002版

组团“出海”抢单 传递经济复苏决心

随着疫情防控“新十条”的出台，中国真正进入后疫情时代，发力经济增长成为各地的重头戏。据《中国贸易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发稿时，已有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湖北、四川、海南、贵州等省（区市）组织外贸企业奔赴欧洲、东南亚、中东、日本等地，主动寻觅海外商机，拓展国际订单资源。

海关总署12月7日公布的最新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38.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不过还需看到的是，11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3.7万亿元，同比微增0.1%，增速较10月份的6.9%大幅放缓，创今年5月份以来新低。其中，出口2.1万亿元，同比增长0.9%；进口1.6万亿元，下降1.1%。多家外贸企业也向记者反映了今年年末外贸订单出现锐减的情况。“与往年的圣诞订单相比，今年的订单在量和价上均出现了减少。”一名在广东的玩具生产商告诉记者。

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11月制造业PMI数据，从需求端看，新订单指数为46.4%，比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6.7%，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回落。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孙晓在11月份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外贸企业面临外需走弱、成本上升、风险加大等多重挑战，订单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进入四季度，外贸进出口进一步承压。

外贸形势不容乐观，让很多企业如坐针毡。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似乎“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就在上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其中特别提到“提振市场信心”“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等关键字眼。这给2023年经济工作定了调。组团赴海外抢订单，各地加大招商引资活动力度等不仅给2022年稳经济画上了圆满句号，也为2023年经济发展开了一个好局。

“一次见面抵得上千百万份书信来往”，这是外贸行业流行的一句话。的确，供需双方见面后不仅可以了解到市场的行情、客户的需求、销售困难以及售后服务，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从目前先行的效果来看，由当地政府机构携知名企业组团“出海”，也自然更能得到外商的信任和支持。例如，11月17—23日，苏州市组织开展了赴日包机服务工作，由12个招商小分队和51位外贸企业高管组成，各招商小分队共拜访62家企业和有关机构，共与日商达成投资意向项目32个，意向投资额18.6亿美元；外贸企业共拜访日本客户200余家，争取订单金额超10亿元。在对日出访取得实效后，为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近日苏州市商务局还继续组织了赴欧洲包机服务，这样的出访活动一直持续到本月18日。据悉，此次出

访欧洲，计划与西门子、克诺尔、法孚、凯辉基金等世界 500 强、全球行业头部企业、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开展沟通交流，并在法国、德国召开一系列专题宣介会。

“要把失去的订单抢回来！”热情奔赴全球各地的经贸团，带着决心和信心“抢订单”，也在向外界传递出中国经济鲜活的生机与复苏的韧性。

帮企业“唱戏”、“搭台”的不仅仅是政府。为配合各地政府组团“抢订单”，阿里巴巴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阿里国际站开启专项行动，将于近期开始推出至少 100 场“数字化混展”海外展会，覆盖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度、巴西、迪拜等十余个重要外贸目标市场。这 100 场数字化海外展会中，包括了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日本东京杂货展、德国慕尼黑太阳能光伏展、德国汉诺威工博会、土耳其国际建材展、英国（伯明翰）国际汽车配件及售后服务展等海外知名线下展会，涉及运动、服装、消费电子、新能源、建材、汽配、机械等类目。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面的情感交流更有利于建立信任，更何况有些商品必须要“眼见为实”，例如按摩椅的功能、食品的口味等必须要有切身体验才能果断下单。当前欧美经济下行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的外贸压力很大，要抓住机会。同时，近期国内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使得走出去的条件具备。相关专家表示，各地组团出海抢订单，除了找回此前流失的时间和订单之外，还增强了外商对我国企业乃至经济发展的信心，也释放出外贸回暖的信号。下一步，地方政府组织经贸团“走出去”，还应不断了解企业的需求；同时也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让更多行业协会、商会等进一步跟进。

作者：张沐锡

来源：《中国贸易报》2022 年 12 月 15 日第 001 版

欧盟要反制美《通胀削减法案》

近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希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等欧盟 9 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西班牙举行会议，要求欧盟委员会对美国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作出共同回应。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也曾对《通胀削减法案》表达不满。

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多国集体发声，表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行径进一步加深了美欧之间的裂痕。

1 损欧利美

据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欧盟 9 国领导人近日举行会议，发布公报呼吁以“欧洲的方式”应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诸多挑战。欧洲国家认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是保护主义政策，有损欧洲产业发展。12 月初曾访问美国的法国总统马

克龙，态度尤其强硬。他在会上明确表示，所有国家都同意有必要对美国的立法作出“强烈回应”，并给出一个具体时间表：明年第一季度。

今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国会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完成立法程序。依据该法案，美国政府将为主要生产环节在美国境内完成的绿色产业提供高额补贴。美方声称，该法案旨在缓解通胀、削减赤字。对此，欧洲国家纷纷表达不满，指责该法案包含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在鼓励本国及海外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美国本土，其本质是损害欧洲工业、为美国企业争取竞争优势。

11月下旬，马克龙访美前夕，法国官员放话称，马克龙打算与拜登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所含歧视性补贴措施“当面对质”。在随后的访美行程中，马克龙在多个场合对该法案提出批评，警告这可能成导致“西方世界分裂”。

拜登在与马克龙会谈后强调，美方的目的并非将欧洲排除在相关贸易之外。白宫新闻秘书卡里娜·让一皮埃尔辩称，美国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对欧洲企业意味着巨大机遇，也有利于欧洲能源安全”。

然而，欧洲国家并不这么认为。近期，除了欧洲多国集体要求反击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之外，多名欧盟官员也接连发声。

德媒报道称，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朗格呼吁欧盟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他表示，《通胀削减法案》的相关内容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欧盟与美国的谈判并不能解决争端。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认为，美国是一个能源出口国，可以从天然气和石油价格的飙升中获益，而欧盟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同时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欧洲的工业为能源支付了更多费用，而且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工业竞争。他希望美国能采取不同的做法。

2 乘人之危

“欧洲多国集体要求反击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情况。”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该法案之所以引起欧洲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美欧贸易投资关系十分紧密，《通胀削减法案》虽然旨在推动美国国内经济，但其产生的影响一定会波及欧洲；二是欧洲国家担心该法案扭曲市场，使企业在非市场因素刺激下做出投资美国的决策，让欧洲利益受损；三是该法案体现出美国一贯自私自利的特性，基于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势必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系统性影响，但美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往往不考虑自身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这次也是如此。

法国《观点》周刊网站刊文称，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美国坐收渔利，在能源上有自主权，在技术和军备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欧洲则正相反，不仅因追随美国对俄制裁而遭受能源危机的痛击，欧洲央行也在美联储大幅加息的逼迫下陷入困境。多重危机冲击之下，欧洲正面临产业、就业机会和资本流向美国的重大威胁。

德国工商大会日前发布信息说，在美投资对德国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推出的补贴和歧视性措施。该机构调查结果显示，其39%的会员企业计划未来几个月在美增加投资，德国汽车供应行业中，每5家企业就有1家计划在国外建立生产厂。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也报道称，随着一些企业因美方补贴政策而把生产转移到美国，

法国估计将损失 80 亿欧元。

“这些补贴是保护主义，是美国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比利时企业联合会欧盟事务负责人奥利维尔·约里斯说。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的背景下，尤其是能源价格飙升，不少欧洲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本就已经考虑将工厂转移到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进一步为新能源等领域的企业赴美设厂提供优惠，将引发制造业虹吸效应，加剧欧洲国家的担忧。”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向本报记者分析称，由此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尽管声称重视盟友，有意改善美国国际形象，但其经济政策实际并未脱离前任政府提出的“美国优先”思路，依然具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这种乘人之危、盘剥盟友的行为，引发欧洲国家强烈反弹。

3 加深裂痕

12 月 5 日，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举行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双方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绿色补贴条款的讨论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为解决绿色补贴争端而设立的美欧工作组工作“取得初步进展”。路透社透露称，工作组寻求赶在明年年初《通胀削减法案》所含部分措施生效前达成协议。

马克龙访美期间，拜登也曾表示可对《通胀削减法案》作“微调”，以照顾欧洲企业利益。不过分析普遍认为，按照目前形势，所谓“微调”会“极其困难”。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经过国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若想再对其进行调整或修改，难度很大。”韦宗友认为，考虑到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美国更有可能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如让欧洲相关企业获得某种形式的豁免或补贴，以此安抚盟友、修复关系。

目前，欧洲国家要求采取措施回击美国的呼声日渐高涨。法国《世界报》近日发表社论称，欧洲国家有理由抗议美国这种明目张胆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保护主义行为。

赵柯认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在给欧洲国家经济带来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美欧之间的裂痕。“受乌克兰危机影响，欧洲国家营商环境本就严重恶化，该法案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欧洲国家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使其更加看清美国为一己私利将道义、规则弃之不顾的本质。”

“美国政府一方面指责他对相关行业进行补贴，另一方面出台《通胀削减法案》，通过政府补贴方式对清洁能源行业进行扶持，实际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正如欧洲官员所说，美国的行为事实上率先发起了‘补贴大战’，如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就可能殃及全球。”韦宗友说。

“当然，欧洲国家也明白，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不仅仅因为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而产生。要想真正摆脱眼下的经济困境，欧洲还得深挖内部潜力，加大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这两大发展战略上的投入力度，继续深化欧洲共同市场建设，如此才能使未来经济增长获得更大推动力。”赵柯说。

作者：严瑜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 年 12 月 17 日第 006 版